

宏观调控政策须警惕“内忧外患”

马 涛

内部风险日趋明显

尽管7月CPI突破了3%的警戒线,但笔者认为我国通胀风险正在消退,即使三季度受洪灾、粮价上涨等影响出现阶段性反弹,仍然难以构成持续通胀的基础,PPI已经掉头向下且涨幅放缓,未来CPI将趋于回落。但是,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三大风险。

第一,刺激消费政策后劲不足。依靠政府补贴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主要指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居民等低消费群体,这些低消费群体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政策效应难以持久。受制于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周期效应,我国汽车消费和家电消费在政策刺激下继续超速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居民消费前景不容乐观。

第二,房地产调控恐拖累经济增长。房地产调控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具有滞后效应,历史经验表明,调控效果会在两个季度后才开始显现。据此可以预计,本轮房地产调控效果将会在四季度比较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会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大幅波动,加剧经济下行风险。

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升级。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飞速发展,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在急剧膨胀。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2010年一季度银行新增贷款有40%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的过高债务如同一枚“定时炸弹”,一旦失去控制,将对国内银行业造成沉重打击,成为我国经济第一杀手。

外部风险日益多变

在前一阶段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慢等因素作用下,下半年经济增长适当放缓已成必然,国内外各种风险因素集聚,使得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结构调整仍是全年政策目标,但下半年调控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同时抑制价格过快上涨,新刺激政策年内不宜出台。

未来政策须维稳灵活

同时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国际资本正大量从发达经济体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全球新的金融失衡正在形成。

第三,各国刺激政策退出策略难以协调。由于全球经济的差异化复苏,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两极化,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依旧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不变,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受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已然走上加息之路。各国刺激政策退出协调难度加大,给全球经济复苏平添新的风险。

第二,货币政策回归适度中性。从7

月份金融数据来看,M1、M2增幅均出现回落,两者之差持续收窄,经济活跃程度有所下降,M2同比增长17.6%,几乎接近年初拟定的17%目标,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逐渐回归历史平均水平。持续通胀基础不具备,经济下行风险也在增加,支持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紧缩政策的理由越来越不充分。货币政策将在上半年调整的基础上,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

第三,房地产调控不能轻易转向。我国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效果初步显现,投机性需求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以遏制。但是在市场成交量降幅较大的情况下,房价并没有出现大面积松动,整体房价依然在高位徘徊。一些城市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在增加住房供应、改变住房结构、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仍有不足。下一步房地产调控要更加重视增加有效供给,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调控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第四,积极财政政策要持续发力。经济结构调整是全年乃至未来长期的政策目标,而调整使得经济增速出现短暂放缓不可避免。为了充分抵消这种不良影响,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不稳固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当刺激政策中最后完全退出的角色,确保政府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连续性和适度规模,在促进居民增收、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推动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焦点评论

专家论道

中国银行业改革仍然“道阻且长”

章玉贵

功于一役,实际上是要激励了坏的银行,会产生道德风险,因为这种银行本身不大可能创造太高的价值。

真正危险仍在于制度缺失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真正危险仍在于制度缺失,在于中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迄今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尽管银行上市并将少数股份售给国外机构稀释了政府的所有权,但得益于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决策层对银行反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政府控股银行管理高层的最终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银行董事会手中。由于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使得决策层在经济不景气时候确实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而在经济下滑时可以增加放贷,为国家的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而这也正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最期待他们金融机构所做但又力有不逮的事。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银行业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借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银行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否因为先前的政府注资或如今的再融资而减少,而是银行是否建立起了一套防止新增不良资产的有效机制。假如银行业间接发放给地方政府的7.77万亿元贷款中的1.55万亿元,真的存在违约风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银行业迄今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司治理和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没有一个内控严密、运营安全的运营机制。

抓紧构筑内生性竞争优势

笔者认为,改制上市只是“道阻且长”的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一步。中国银行业要想成为广受尊敬且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亟待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并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否则,一旦美欧同行恢复元气,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

的确,相较于几年前的市场竞争压力,目前正是中国银行业者抓住机遇、培育内生优势、做大做强的难得时机。尽人皆知,中国银行业的昔日偶像,无论是花旗、汇丰还是苏格兰皇家和德意志银行,经由本次金融危机冲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预计美欧银行业至少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但留给中国银行业抓紧构筑内生性竞争优势的时间大概也只有这3年了。时不我待,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中国金融业者,切莫看重再融资和增加收费额度这类短期行为,而应把握这段难得的时间窗口,切实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力争将自己打造为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世界级金融企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实话实说

面对“国际粮荒”当未雨绸缪

李云峰

继俄罗斯宣布实行出口禁令致使全球小麦价格被大幅推高之后,乌克兰也打算限制粮食出口,以保障其国内粮食安全。乌克兰农业部长普里纽克近日表示,受干旱天气影响乌克兰粮食减产,在今年7月至明年6月的农业营销年度中,总共可出口粮食1600万吨,比上年度减少500万吨。

类似于2008年一样以“粮荒”为代表的国际粮食投机高潮或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现。虽然这对于“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且与国际粮食市场存在防火墙的中国粮食安全而言,并无多大实质性冲击,但是高度关注这种趋势的演变也应是未雨绸缪的必然选择。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亚洲主要国家基本都不会受到“国际粮荒”的影响,因为中国、印度、越南等国都是粮食完全自给的国家,但是如果未来国际粮价再持续高涨,为了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的限制性举措有可能出台。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国有粮食企业原

粮总库存超过4500亿斤,库存消费比达40%以上,远超国际公认的17%至18%的安全线水平。

受“国际粮荒”伤害最大的将是非洲、拉美、中东等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中东地区属于石油资源的“黑金地带”,粮价价格暴涨对其影响和冲击并不会太大,而非洲和拉美的不富裕和贫穷国家若是遭遇类似于2008年“国际粮荒”时的粮价飞涨,粮食短缺引发的国内问题或将异常严峻。

实际上,从总量来看,全球目前并不缺粮,但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生物能源消耗了至少数亿人口一年的粮食消费总量。根据目前公认的数据来看,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大约只能加工70升左右生物燃料,而70升生物燃料大约能让一辆普通轿车跑700公里,以玉米制造生物乙醇为例,在节省全球2%的石油消耗的同时,却能造就粮价上涨30%左右的驱动力。由此可见,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生物能源产业和粮食投机资本的推动,是“国际粮荒”现象出现背后相映成趣的“哼哈二将”。



国务院批准深圳城市建设十年规划

财经 漫画

直言不讳

国企红利应更多惠及百姓

王瑞霞

据媒体报道,财政部正在向82个中央部门征求意见,以获得其对中央部门管理企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收取红利的态度。通过“扩范围、调比例”的办法做大国企上交红利的蛋糕固然值得肯定,但在红利支出结构中更多地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让国企红利惠及普通百姓,亦应在通盘考虑之中。

2007年9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正式开始试行。2007—2009年,共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1572.2亿元,相对于可观的央企利润,这个数字实难令人满意,单是2009年央企利润总额就高达8151.2亿元。也正缘于此,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范围,提高红利征收比例呼

声渐起,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比重。根据《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央企红利的支出范围主要包括: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发展要求,以及国家战略、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资本性支出;用于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费用性支出;必要时,可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等项支出。实际情况是,在近年来的央企红利支出结构中,资本性支出和费用性支出占了绝对的大头,社会保障支出可谓凤毛麟角。相关资料显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008—2009年达1553.3亿元,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业灾后恢复生产重建、中央企业重大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境外

矿产资源权益投资以及改革重组补助支出等,简而言之,国企红利主要安排用于央企体内循环,极少流入“外人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真正将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以来,鉴于央企重组压力大,任务紧,将国企红利更多地用于央企改制重组成本支出、提高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可以理解,但随着央企重组进程加快,央企整合目标日趋接近,在国企上交红利中划出更多的份额转向社会保障支出,理应成为优化国有资本预算支出结构的努力方向。央企做大做强值得鼓励,但也不应该就此忽视国民分享央企垄断利润、分享经济成长收益的权力。而且按照国际惯例,通常

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用于公共支出,如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及韩国等国都是如此。

将国企红利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也是缓解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现实之需。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达上万亿元,虽然通过国有股转持社保资金得到一定的充实,但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仍属杯水车薪。2009年央企向社会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也就429.68亿元。倘若将部分国企红利作为筹集社保资金的又一渠道,那么这股“活水”将可以有效地弥补社保资金缺口。此外,如果把国企上交的红利更多地投入到社会保障建设,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受益,有利于拉动社会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联系我们

本篇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